



鄧立光 著

中國哲學與文化復興詮論

現代的學術研究幾乎全著重學術著作的量(而質次之，甚或不重質)，而教育工作的重點也集中在知識的傳授，所謂“尊德性”已經是一句沒有實踐意義的大言。知行脫節，缺乏親證，實在是今日治人文學科者的通病。就研究中國哲學的人而言，這個病痛即反映了他們與中國哲學的傳統精神相違了，道問學一層容或做足，尊德性一層則非要務，去精取粗，淪為知解之徒，則如何能承擔復興中國文化、中國哲學的使命？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鄧立光 著

中國哲學與文化復興詮論

現代的學術研究幾乎全著重學術著作的量(而質次之，甚或不重質)，而教育工作的重點也集中在知識的傳授，所謂“尊德性”已經是一句沒有實踐意義的空言。知行脫節，缺乏親證，實在是今日治人文學科者的通病。就研究中國哲學的人而言，這個病痼即反映了他們與中國哲學的傳統精神相違了，道問學一層容或做足，尊德性一層則非要務，去精取粗，淪為知解之徒，則如何能承擔復興中國文化、中國哲學的使命？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中國哲學與文化復興詮論 / 鄧立光著. — 上海 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8.12

ISBN 978-7-5325-5111-8

I. 中… II. 鄧… III. ①哲學－中國－文集②傳統文化－中國－文集 IV.B2-53 G12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8) 第 169717 號

中國哲學與文化復興詮論

鄧立光 著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發行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: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颺輝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90×1240 1/32 印張 8 插頁 5 字數 200,000

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 1—2,3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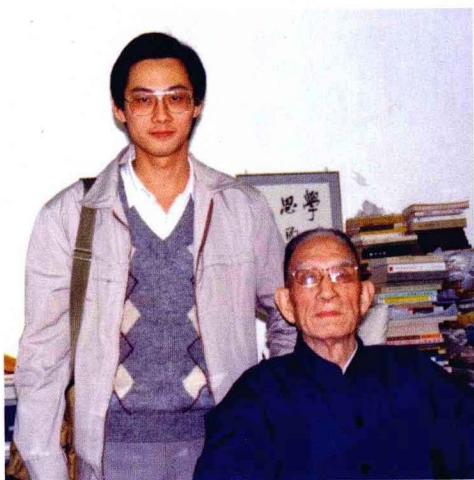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25-5111-8

B·650 定價: 2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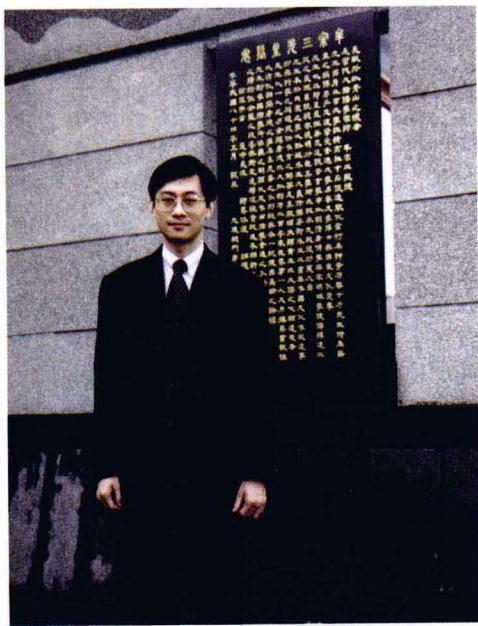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質量問題, 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謹以此書敬獻予恩師。

牟宗三先生



與牟師合影（1988年11月19日於香港新亞研究所）



牟師墓園前留影（1996年12月25日於台北縣新店市竹林路）

前 言

本論文集所收乃余研究中國哲學專題之成果，各文皆曾在學術期刊發表。儒家與道家道教乃余之重要研治範疇，而文化類則為對當前如何發展所作之哲學思考與指點，以期為民族之自盡其性有所貢獻。

溯自乾嘉時代，學者以窮研典籍為高，遂使明末清初之經世學風戛然中止，自此以後，知識分子之視野日漸狹促，既無預於事功之開展，亦卑視身心性命之講求，其末流乃如牟師宗三先生所沉痛鍼鞭者：

稍有文物度數之沾溉者，則又沾著陳跡而玩物喪志，不能通文化生命之源也。沾嚙吟哦於詩詞典籍者，則又習焉而不察，徒為其黏牙嚼舌之資具。有終生讀中國典籍而與其生命無交涉者。稍有穎悟者，亦能就眼前積習風光而略得旨趣，然而不能深入底蘊而通文化生命之源也。此為感性之欣趣，而非思想慧命、德性光輝之遙契。又有較為穎悟者，亦能稍通義理之源，然而淺嘗捷取，不能資之深而左右逢源也。……故不能“大德敦化”也。此皆為積習所限，不能撥陳跡而通慧命，故不能開

拓變化，為民族生命立道路。此非有大才大智大信，強烈之原始生命，固難語於華族之慧命也。《五十自述·客觀的悲情》

以此，余之研治中國哲學，除本科範疇之學理研究以外，並關涉家國社會，不以處象牙塔尖為貴。

憶自一九八六年底余正於香港大學中文系攻讀碩士課程，因敬服牟宗三先生，遂同時兼讀香港新亞研究所之哲學碩士課程，隨牟師學習。牟師之第一課開講《老子》之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直使余發聾震聵，原來天道竟可講述得如此之活潑潑有生命力，遂覺悟以往為乾枯學究之非，此為余治學層次之大躍升。

一九八八年某次課後師生小聚，余就當時內地興起以氣功言哲學之觀點請教牟師，牟師誤以為余信從此說，遂盛怒而嚴責之。此一怒責，使余驕矜之氣頓然全消，接近半月之深沉反省，終獲生命內外俱靜之欣悅，從此走上希賢希聖、修己以敬之道路。此余治學境界之第一次大轉進，此亦余尊牟師為恩師之故。

一九九六年，余隨緣參觀香港某道堂並考察扶乩，降壇神靈（觀世音菩薩、呂祖仙師、黃大仙師）皆唱“道佛一家，無分彼此”，而人神之溝通竟又是如此之親切。此一衝擊非同小可，余之學問排山倒海般崩解，四顧茫茫，一無所有矣。長達半年之學問重塑，最後儒釋道三教和同之學問新格局於焉以成，此余學問境界之第二次大轉進，而脫胎換骨矣！

藉本書出版之際，余寫下生活中泛起漣漪之片斷，為理性之學術研討帶出背後之感性生活，為體道生命如何轉進留下一點歷史痕跡，為復興傳統文化事業之志士提供一點參考。

鄧立光 誌於沙田寓所

二〇〇八年之清明節

代序一：牟師新學宗前聖 尼山古道至今傳

1995年8月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云“仲尼歿而微言絕，七十子喪而大義乖”，然而孔子之道至今傳，則千載以下，四海之間，必有同心同德，能善述其事，善繼其志者矣。

宗法仲尼，牟師之志。宗孔子乃所以開民族之慧命，前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。孔子述三代儀文，以仁爲首出，性爲根源，由乎帛書《易傳》，考見孔子之就筮書而言義理，凸顯主體之道德意識，而開中華民族之慧命，即此已足爲百代景仰矣。牟師會通中西，接引康德，重新展示傳統之形上智慧，此一創造性之轉化，遂使民族之慧命得以活潑潑地申於當今之世，一代文運由是而啟，而斗筭之人，以便巧分析，斷斷致辯，帛書《要》載孔子云：後世之士疑丘者，或以《易》乎？轉化工作之艱難，於此可見。所謂賢者識其大，不賢者識其小，古今皆然。

有得於孔子之思想，然後知孔子堂廡之大也。顏淵親承聖教，而有瞻前在後、欲從末由之歎！余於孔子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，然後知七十子於孔子之所以心悅而誠服，然後

知牟師於孔子心悅而誠服^①。余於孔子心悅而誠服，由是契會牟師，由是契會七十子，由是契會孔子。以此知牟師歸宗孔子，乃其真實無妄之生命所必至者。薪火相傳，原不以時空為限隔也。

千古傳心，唯在精神之感召。熊十力先生云當今之世唯我能講王陽明，此中必有真精神之互相呼應。熊先生發獅子吼，牟師受此震動，遂煥發真精神，而上接傳統文化之慧命，其終也契入孔子之生命。八十年代中期余正於港大中文系念碩士學位^②，讀牟師《從陸象山到劉蕺山》，拍案叫絕，不能自己，此情此景，今猶歷歷；余震於書中人物生命與思想之躍動，遂知所謂學者著書，馳騁聰明，橫剖直陳，仍只是材料，此即大儒與學究之判，而有否真精神之大較也。時牟師設教於新亞研究所，感發興起，遂往受學，師弟間一段緣份，就此建立。牟師晚年，深造自得，純亦不已，余有幸熏染於牟師之高明博厚，精神由之而拔俗，志氣由之而昂揚，於聖人之學亦知所從事矣。

牟師孜孜為學，不暇名利；簡而恭，儉而安；傳道授業，志在斯民；仁為己任，老而彌堅；大儒氣象，昭如日月。必有孔子憂道不憂貧、謀道不謀食之志，然後能善繼牟師。處學問以真誠，則精神不期而暢旺；功利之念既泯，人品由是而出，學問與生命貫通，唯才德備者為能；故孔子戒子夏云：“汝為君子儒，毋為小人儒。”成德為君子，逐利為小人，故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君子儒也者，日新其

① 筆者參加八十年代後期一次在新亞研究所舉行之孔子誕辰紀念儀式，具體年份已忘，該次儀式分別由唐端正師及全漢昇所長作專題演講及致辭，最後全體肅立，牟師站在第一排，筆者站在三、四排，從側見牟師雙手合放於後，仰望誠明堂上之孔子像，尊崇之情，誠中形外，筆者大受感動，印象猶深。

② 斯時正隨杜維運師研究明末清初之學者陳確乾初，杜師以歷史人物之研究須有會於其生命，此筆者得諸杜師，故乾初注我，我注乾初，而後深體乾初之學問，乾初之師即劉蕺山，故參考牟師所著《從陸象山到劉蕺山》，與牟師之緣種因於此。

德，憂道憂民。孔子行道，知其不可而爲之，乃有不同於尋常萬萬者之民物之情。聖賢無分古今，其生命形態皆如橫渠所云：“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，爲往聖繼絕學，爲萬世開太平。”牟師氣魄固不止於純學術，乃以疏通傳統學術而賡續吾民族之慧命。善述孔子之事者有之矣，善述牟師之事者亦有之矣。若夫善繼孔子之志，善繼牟師之志者，則必非一時之選也。文化不能無偉人，學術不能無宗師。開一代之文運，挽不世之狂瀾，臻國族於康泰，寄玄義於永恒，此之謂可大，此之謂可久。

精神感召，無關資稟。爲學之方，有才情焉。牟師治學之門徑已不同於熊先生，各因性情而篤行焉，斯可矣。牟師學說，廣大精微，固當繼續弘揚，深入發掘，而師學所未至者，理應有所開拓，牟門弟子，責無旁貸。

牟師於文化，疏通致遠。牟師之學，自有真精神貫注於其中，故其學爲活學。純學術之研究，若無此段精神，於牟師之學則成無源之水，其涸可待，於此了無自覺者，則入學究之途，此之謂沉淪。客觀學術自有套路可循，依樣葫蘆者亦彷彿得之，唯精神氣魄，有無立顯，虛僞不得。晦翁謂子靜門下多有氣象，此無他，先立乎其大者也；當下提撕，有精神，自有境界，不爲利欲低頭，而後學問爲真，生命無妄。學孔子，學牟師，須使生命放光，生命亦必然放光，僅以牟師《哲學的用處》一段文字收結本文，懷緬牟師，並以自礪。師云：

這些讀哲學的人對於時代沒有感覺，沒有反應。時代的問題，中國文化的問題，國家命運的問題，經濟處境的問題，他們都沒有興趣，也根本不懂。他們自稱是對哲學作純學術的研究，不牽涉那些空泛的大問題，實則只是退縮成蝸牛，躲在那兒。……讀哲學要發光，要立志，要決心把自己的生命弄清

楚，把自己的思想弄清楚，把光源弄清楚，這樣將來才會發光。這不是很容易的，但也不是很難的，這裏有一定的道路，有可以用心用力之處，可是一定要下工夫去做才行。

附識：本文因楊祖漢先生談到能否寫牟師之悼念文字而成。牟師春風化雨數十年，獲沾溉者多矣，余受學於牟師晚年，生活瑣碎，所知不多，唯因精神感召，生命受大震動，沾潤之恩，沒齒不忘。牟師大殮之日，刺激實深。祖漢先生之言，再次牽動情緒，遂成本文。

代序二：中國傳統哲學的返本開新

1998 年 12 月

一、中國傳統哲學史略

中國哲學以《易經》為其根源，而激盪於儒、釋、道（道家、道教）三家。儒、道二家繼承了中國上古的思想而有所發展，同為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大宗。儒家的形而上學道德意味重，以《易經》、《易傳》、帛書《五行》、《孟子》及《禮記》之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、《樂記》等為代表，強調天道與德性的關係。道家的形而上學則宇宙論式的直觀氣息濃，以《老》、《莊》為代表，視天道為玄遠的形上實體，人能玄覽天道，則可以提升生命境界，直與天地為一體，而知天道之自然。道教以修煉為主調，奪造化之機，至於“宇宙在乎手，萬化生乎身”，這可以《黃帝陰符經》為代表。

漢代以還，佛教東傳，經過高僧大德的努力弘揚，佛教哲理得以在中土流佈；六朝以後，佛教義理影響中國哲學的發展甚鉅。入宋而有理學的興起，理學是中國傳統文化回應佛教的學術思潮，而

理學有取於佛教哲學也是不爭的事實，但理學的核心仍然是儒家孔孟的老傳統，精神依然是思孟一系的心性之學。

中國傳統文化吸納外來的文化成分，必須在不失其自己的情況下才有真正的發展，宋明理學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在自尊自信的前提下吸收佛教的義理，從而開拓儒家道德學說的理境，並成就中國學術史上影響深遠的文化與哲學思潮，今天宋明理學以現代新儒學的形態出現，並吸收了西方哲學中如康德、黑格爾等的學說系統以充實並撐開宋明理學的義理；在吸收西學的同時，能將宋明理學的精神凸顯出來，當以牟宗三先生的成就為最著，其傳世鉅著《心體與性體》與《從陸象山到劉蕺山》共四冊，是對宋明理學的一次大檢閱。牟先生融化康德學說，將宋明理學的義理層層撐開，並以之適應現代學術的要求。理學由此獲得強大的生命力，此理學新格局將對中國哲學發揮指導性的力量而有莫大的影響力。

中國哲學傳統的另一重要內容是陰陽五行，它不專屬於任何一家；從《逸周書》的記載，五行思想在西周初年已經成熟，而五行思想成熟的標誌是五行方位及五行色尚的確定；《逸周書·作雒解》載周公用五色土分別對應五方以封土建國，顯示了極濃厚的五行思想。陰陽思想一直是古代哲人觀天道的重要憑藉，由於陰陽與五行同屬元氣流行的哲理，因同源而合流。陰陽五行思想對中國哲學的影響非常重大，任何學派，都要正視陰陽五行，只是所得有深淺之別而已。

中國文化是一個道德的文化體系，構成中國文化的高級組成部分如學術思想都與道德相關，倘若離開了道德的內容便難以有真正的發展。重視德性不止於具體的倫理關係，而必及於德性的源頭——天道。天道玄遠，但古人卻能找到德性的根源，稱之為天命，一旦言及天命，便具有道德根源的意義。就對“天”的解悟而言，古哲強調了悟（直覺把握）及不重視概念的分解說明，因而傳統

哲學的形上世界是多向度卻又圓融無礙。

二、恢復尊德性而道問學的傳統

中國哲學的傳統是“尊德性而道問學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”的，要重新建立本色化的中國哲學，則必須於純粹思辨之外，對形上世界有真正的體會，即所謂證悟；建立概念，建構系統是今日中國哲學研究者的重要任務，但如純粹滿足於此，則雖可有建樹，亦只局限於知解一層，實在難以窺見中國哲學的堂奧。饒宗頤教授在《明代經學的發展路向及其淵源》一文借古諷今，鍼鞭現代人做學問的缺失：

向來以明經取士，把經學弄成教科書式的工具，作為士人入仕的“敲門磚”，漢、宋皆然，明人取士，仍循這一老套，只是不遵古義，往往自標新解。……現代的專家式教育，通過考試制度培養出來的人物，往往只曉得查書，而未必真能讀書，連文字表達技巧，有時都辦不到，制度害人，古今是一樣的。^①

今日的教育制度、課程安排、以及考核重點等等，只會把具有極高價值的學問、知識弄成圖名圖利的工具（手段），在這種制度之下學子的器識給埋沒了，自然培養不出大學問家、大思想家的目光和胸襟。在傳統哲學的領域中，人的品格最為重要。饒教授說：

① 見林慶彰、蔣秋華主編：《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（台北：中研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，1996年6月），頁18。

元、明人治經，最重要還是實踐工夫。……明儒講道，隨時可以殉道。……明儒為貫徹義理，在實際行動上表現可歌可泣的犧牲精神，……明人所殉的道，確實是從經學孕育出來，是經學與理學熏陶下放射出的“人格光輝”……^①

治經重實踐，治其他學問亦然。自然科學以實驗檢核對錯，社會科學以實證確立原則，人文學科便應以研究者自己的生命來踐行自己的學問。能够知行合一，則學問為真，否則為假；知行合一，則人格有光輝，生命發光芒。真正的中國哲學研究者都正視德性，而德性必須與生命連在一起才有意義。牟宗三先生說：

中國的學問以“生命”為首出，以“德性”潤澤生命。從自然到生命，既須內轉，又須向上。因為這樣才能由“存在的”現實而契悟關於生命的學問。……須透到那潤澤生命的德性，那表現德性或不表現德性的心靈。這裏便有學問可講。這裏是一切道德宗教的根源。^②

現代的學術研究幾乎全著重學術著作的量（而質次之，甚或不重質），而教育工作的重點也集中在知識的傳授，所謂“尊德性”已經是一句沒有實踐意義的大言。知行脫節，缺乏親證，實在是今日治人文學科者的通病。就研究中國哲學的人而言，這個病痛即反映了他們與中國哲學的傳統精神相違了，道問學一層容或做足，尊德性一層則非要務，去精取粗，淪為知解之徒，則如何能承擔復興中國文化、中國哲學的使命？

① 《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頁 22。

② 《五十自述·客觀的悲情》（台北：鵝湖出版社，1989 年 1 月），頁 89。

儒、釋、道三教皆重視人的主體性，不論是成聖，成佛抑或成仙，修德者或修道者都須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德性；成就德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，而古哲對於修身立德都有嚴格具體的要求。成德是中國傳統哲學的要義，以德性為基礎建立形而上學，由此證成道德的先天依據，所以中國傳統哲學不離“人”而孤離地、抽象地言“天”。

三、強調知行合一的生命觀

中國哲學要反本開新，必須重視失落已久的知行合一傳統。知行關係是中國哲學的老題目，《尚書·說命中》已言“非知之艱，行之惟艱”^①，可見古代哲人對知行關係的重視，而這也是宋明理學家所共同關心的課題。能够知行合一，則學問為真，而人格有光輝，生命發光芒。朱子說：

徒明不行，則明無所用，空明而已；徒行不明，則行無所向，冥行而已。

知與行常相須，如目無足不行，足無目不見。論先後，知為先，論輕重，行為重。

為學之道，更無他法，但能熟讀精思，久久自有見處；尊所聞，行所知，久久自有至處。

學問是自家合做底，不知學問，則是欠闕了自家底，知學問方無所欠闕。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。^②

① 偽《古文尚書》雖非原本，然內容有本，非杜撰之文。

② 張伯行：《續近思錄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6月）卷二。

朱子所強調的，是尊所聞，行所知；知在行前，行較知重；知行不可偏廢，否則只成“空明”與“冥行”；學問先從自己生命做起，最後也歸本於人品的提升。

王陽明強調知行合一，目的是對治世間知而不行的陋風，所以說“某今說個知行合一，正是對病的藥……”^①，但真正做知行合一工夫，是在起心動念之際，即須克除惡念，所以說：

我今說個知行合一，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，發動處有不善，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，須要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，此是我立言宗旨。^②

陽明的知行合一是在念慮之微、一念生起的時候做工夫，這已是“行”；有一念不善即立刻克倒此念，不待表現於行事時才去改善。否則，當身心為不善之念所牽引，而後謀求補救，則費力多而收效少。在起心動念的時候即做克己工夫的修德方法，是中國古來修身養性的“共法”。“知行合一”與“慎獨”，名目雖異，而實際的修為是相同的，可以說“知行合一”是“慎獨”的工夫論。

理學家重視實實在在的修養，而不是搬弄知識，炫耀博學，否則便成了荀子所譏的“口耳之學”與陸象山所諷的“兒童之學”。玩弄概念，說門面話，實無助於修德。因此，中國哲學研究者不能止於道問學一層，必須重建尊德性、知行合一的傳統；這是一件文化事業，是有理想、有承擔的人所必須做的工作。

① 《傳習錄上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4年6月）。

② 《傳習錄下·黃直問知行合一》。